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孩子降生以后,第一个学校便是家庭,这个学校的第一任教师,便是他的父母。”近日,国家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邓丽婷做客国学讲座,结合传统智慧破解家庭教育难题,讲述《鉴古知今 智慧育儿》——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

■文/本报记者 许 珂 图/本报记者 黄 沐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特质，通常由家族中学养和威信较高者总结祖上成功经验和教训，汲取主流价值观念，为子弟制定生活起居、为人处世、入仕为官等行为准则、经验教训，以训诫子弟。优秀的家训对一个家庭、家族，乃至社会都有很好的教化作用，对人的品格养成有着重要意义。

古人富有育儿的智慧。如，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注重胎教，孔子注重以诗礼传家，谢安强调身教重于言传，等等。

古人通过“家规”“家训”“家风”培养优秀品格

古人认为，一个孩子的好坏取决父母的言传身教。如，《韩愈家训》《包拯家训》、欧阳修《诲学说》、纪晓岚“四戒”“四宜”、《颜氏家训》《曾氏家训》等。

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意思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和教育家，他不仅自己功成名就，而且把9个子女都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家教传奇。梁启超本人被称为“中国家教第一人”“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梁启超教育子女的秘诀可以归纳为6个字：意育、智育、情育。

意育即培养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他认为，子女能否成才，关键是看有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这是战胜一切挫折的武器。他从不溺爱孩子，要求子女要守住寒士家风、门风，鼓励子女到逆境中磨炼。比如，梁思成、林徽因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父亲梁启超建议他们不要去生活舒适的清华园，而是去条件艰苦的东北大学任教。梁思成夫妇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埋头于中国历史建筑的教学、研究与田野考察，后来成为中国建筑学领域的翘楚。

智育就是专业知识。梁启超认为，人的智商虽然很大一部分是天生遗传，但通过后天努力学习，不断挖掘自己的潜能，也是可以成为有用之才的。因此，他很注重子女们的学业，然而又不是非常在意他们的考试成绩，而学习态度与治学精神，这是他非常看重的。他建议子女在专业知识方面既要广博又要精深。梁思成的专业是中国建筑史，为了开阔视野，梁启超建议他在西洋美术史方面也要多下些功夫，还专门筹集5000美元，让梁思成、林徽因在美国毕业后取道欧洲，对西洋美术、建筑进行实

地考察。

情育就是人们讲的情感教育。梁启超非常重视亲情的陶冶，他给子女们写了400多封家书，共计100多万字，最长的家书有5000多字。梁启超家书可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比肩，被称为中国三大家教典范。梁启超在家书中经常提醒儿女们要孝敬长辈，重视培养子女们的爱心、同情心。他在给子女的信中反复说：“你们须知，我爹爹是个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十二分热烈。”他的大女儿梁思顺，30多岁了，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他在信中还亲热地称她为“宝贝”“宝贝思顺”。他多次说：“人生在世，要常思回报社会之恩。”在他看来，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做智、仁、勇三者兼备的人，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学问次之。

古人还认为，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环境是孩子形成正确思想和优秀人格的基础。

如，诸葛亮54岁时写给他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提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道德修养的人，是这样进行修养锻炼的，他们以内心平静来使自己尽善尽美，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的志向明确坚定，不安定清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理想。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如果不下苦工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陶冶性情使节操高尚。如果年华与岁月虚度，志愿时时消磨，最终就会像枯枝落叶般一天夭衰老下去。这样的人不会为社会所用而有益于社会，只有悲伤地困守在自己的穷家破舍里，到那时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邓丽婷

现代人教育孩子,应反思教育理念、调整教养方式

现代人教育孩子，首先应该要重视孩子责任心的培养。

责任心是一种担当，一种约束，一种动力，也是一种魅力。他是能力发展的催化剂，也是孩子形成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可或缺的基础。

那么，怎样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呢？一是言传身教。责任感是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价值观不可以用言语直接传授，孩子只会被那些他们爱戴、尊敬的人同化，通过模仿他们来吸收他们的价值观，并且成为自己价值观的一部分；二是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鼓励孩子帮助他人。

其次，应该重视孩子“人”的培养。精神营养相对于“物质营养”，指孩子在不同阶段的心理需求。如，被接纳、被认可、被赞美、被尊重等。这些隐性的元素，不同的人被满足的情况不同，于是出现个性差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同性格。不同的性格处世，就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若想培养孩子成为有“精神的人”，就必须无条件地接纳不同时期的他，让他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视，时刻感受到一种安全感和爱。作为父母，要肯定、欣赏、赞美、认同他，让他有选择的自由。

若想培养孩子成为“社会的人”，就必须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帮助他树立健全的法制观念和道德观念，遵守社会规范；培养他融入社会的能力，注重对国家的忠对父母的孝。

再者，要学会尊重孩子。叛逆心理是指人们为了维护自尊，而对对方的要求采取相反的态度和言行的一种心理状态。家长一方面用自己的认可方式去对待孩子；另一方面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要求孩子，于是亲子之间出现鸿沟，在心理学上这

叫代沟，在社会学上叫价值观冲突。所以，父母一定要成为孩子的朋友，父母与孩子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鼓励，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扶持。

第四，应重视亲子有效沟通，把“不”语言转化为正面语言。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教育环境中，每个人接收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阅历和视野，理解力和表现力也是不一样的。父母要想让孩子听懂自己的话，并按自己的指令来完成事情，一方面在给孩子下达指令时，指令要清晰具体；另一方面需要花时间对孩子进行反复的实践训练。

第五，要批评慎用，表扬善用。“建设性批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概念，“建设”是指“建造”，而“批评”意味着“拆毁”。既“建造”又“拆毁”，让人无法理解。所以，茜德·西蒙把“建设性批评”定义为“束缚性的渣滓”。如，“儿子，上次你考75分，这次你考了90分，你进步了15分，妈妈替你感到高兴”，这就是描述式鼓励。

最后，要无条件地爱孩子。真正的爱是一个生命喜欢另一个生命的一种情感，不带有任何潜在的东西。你优秀我爱你，你不优秀我也爱你，我爱你因为你优秀，我爱你哪怕你不优秀。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会很灿烂地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颗还没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看着长大，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老子说了什么》——

道法自然

■李德元

老子曰：“道法自然。”

运动是宇宙存在的基本形式，没有运动也就没有宇宙。对于这一点，在老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无论是希腊哲学家，还是中国哲学家，都有充分的认识。但怎么认识宇宙运动，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

一种是从事物的外部来寻找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一种是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来寻找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所体现的乃是后一种思想路线。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说：“显然存在某种第一动因，而且无论在直接后果上还是在种类上，事物的原因都不是无限多的。因为质料不能是无限的，一种事物出于另一种事物，不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运动的源头也不能是无限的。同样，终极因（即目的）也不能无穷倒退。”（《哲学导论》【美】罗伯特·C·所罗门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P85 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X存在是为了Y，Y存在是为了Z，那么必定存在某个解释它们所有的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把这个终极因归结于上帝。

他认为在任何过程都起作用的是四种基质或者四种原因：（1）质料因。既构成事物的质料，例如构成勺子的银和组成我们身

体的血肉；（2）形式因。是指当事物完全实现其目的时，在事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模式或结构；（3）动力因。即通过做某事实际上使另一件事发生的人或事件；（4）目的因。目的因是制作事物的目的。目的因也是终极因。而上帝是所有事物的目的因；他是世界的最高目的或者最高的善。世界上所有的存在者，如植物、动物和人都因这一最高的善或上帝而渴望实现其本质，上帝的存在是它们欲望的原因。因此上帝是世界的统一的和指导性原则，是所有事物努力实现的目标，是解释世界上所有秩序、美和生命的原则。（《西方哲学史》【美】弗兰克·梯利著 贾振阳等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P96、97页）。

到了牛顿时代，牛顿从物理学意义上肯定了“第一推动力”来自上帝。也就是说，宇宙运动的第一脚是上帝踢的。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从“目的因”将“第一推动力”归结于上帝，只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而牛顿从物理学意义上肯定“第一推动力”来自上帝之说，则将对宇宙运动规律的认识变成了宗教崇拜。由此也宣告了从事物外部寻找事物变化的动因，此路不通。

现在，我们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指摘“第一推动力”来自上帝是唯心主义世界观，是十分荒谬的。指摘牛顿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由此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而背叛了科学精神。但从历史的实践意义上看，笔者认为这是西方哲学最聪明的安排。因为不假定一个终极因，永无休止的纠缠下去，浪费了资源，还没有结果，必定影响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故西方哲学将“第一推动力”归结于上帝，将对自然规律探究问题宗教化，其实质是用宗教权威阻止了对“第一

推动力”的探究，以免人类在这条死胡同里面钻牛角尖而不能自拔。牛顿不但没有背叛科学精神，而是用他的睿智引导社会走上了正确之路。当西方宗教权威阻止了对“第一推动力”的探究之后，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转向了对事物本身的探究，倾注在发现事物的具体方法上；倾注在从所发现的事物中产生出来的知识上；倾注在利用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事物上。从而发展出了现代科学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

老子是中国哲学宇宙论和本体论（中国哲学将其合称为本根论）的奠基人。在老子创立本根论时,似乎就已经意识到了“终极因”的问题,且意识到“终极因”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问题。故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思想。

“道法自然”之“自然”，不能作名词解，应作自己如尔之意解。也就是说，“道”以自己为法，而别无无法。

“道法自然”的思想意义主要有二。其一，“道法自然”的思想意义主要有二。其一，老子把宇宙起源的起点定位在“有物混成”之时。至于“道”是何物所混成，又如何混成，不予究竟，自己如尔而已。老子为什么把宇宙的起点定位在“有物混成”之时，我认为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的有限性所制。宇宙间的一切存在都是有限的，人也是有限的，人类应该尊重其有限性。正如庄子所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怠而已矣。”（《庄子·养生生》）；二是认识的目的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存在都是有目的，“自然从不徒劳”。老子所说：“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其涵义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从不徒劳”有相通之意。既然自然的一切存在都有其目的性，则人对自然的认识也应该有目的性。故老子

主张为利而用。人类之所以要认知尚不认知的“无”，是为了有“车之用，器之用，屋之用”。而对于尚无用之“无”，暂切存而不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把“有物混成”作为宇宙——道——的起点与西方哲学把“第一推动力”归结于上帝的用意是一样的,都是对“终极因”存而不论。

老子主张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来寻找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道法自然”就是“道”以自己为法,而别无无法。所以,事物变化的动因在事物的内部而不在事物的外部。我们要认识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必须立足于“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不能离开事物本身损益之机制，去探究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老子的思想并没有被后学所理解，所因循。在老子提出《道论》之后，中国哲学的本根论有《太极阴阳论》《气论》《理气论》《唯心论》等诸多学说。这些学说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也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是学说所主张的都是“一元论”。

所谓的“一元”指宇宙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和天地万物的本原。《春秋繁露·玉英》：“谓一元者，太始也”。《汉书·董仲舒传》：“《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据此定义，一元论之实质就是在事物外部确定一个决定一切的终极存在，即“终极因”。这与西方哲学的“第一推动力”是殊途同归。如果说，西方的思想家们在将“第一推动力”归结于上帝之后，就此打住了对“第一推动力”的探究而转向了科学。而二千多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在寻找“终极存在”（即第一推动力）上是

迷途而不知返。

《太极阴阳论》以太极为宇宙的本根，《气论》以气为宇宙的本根，《理气论》以理为宇宙的本根。都是在事物以外，确定一个“终极存在”来解释宇宙的一切运动。如朱熹所言：“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语类》）王阳明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物穷理”，亭前格竹，搬一张椅子坐在自家院子里，对着一簇竹子，瞪着眼睛看了七天。结果不但没有格出竹子之理，自己还大病了一场。故大骂朱熹“格物穷理”之荒谬。直到一天，他在睡梦之中，被一声炸雷惊醒，幡然醒悟，原来“心外无理，心外无事，随着事物变化而变化的。有这样一种事物，就有这样一种法则，有那样一种事物就有那样一种法则。宇宙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法则也不能离开存在物而有所谓超然的存在。但中国的先哲对此却缺乏应有的理解。由于对事物的本质——法则——缺乏认识，尽管先哲们的学说中有一些唯物主义的元素，但一直不能发展出系统的唯物主义思想。由于缺乏唯物主义的 worldview，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始终没能引导中国社会走上科学之路。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憾。